



从思想革命到心理改换

——论《新潮》同人对新文学启蒙伦理的推进

危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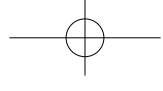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以新文学承载的新思想纠正国人的荒谬思想渐成文学革命中新文化同道的共识。而与师长相比，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等知识资源成为《新潮》同人重建新文学启蒙伦理的重要凭藉。通过“文学”的重新定义，《新潮》同人把“哲学”作为文学的“头脑”，凸显文学革命中的“思想”路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创造性转化则把“言说晓喻”式的思想启蒙推进到心理改换，与人的生理本能直接相关的“感情”概念被重新发现，新文学的启蒙伦理变为“感情”-“刺激”-“行动”的心理学原理。“文学”因而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行动性的即物性概念，文学革命也真正具有了把思想革命推向行动的可能。

关键词 《新潮》同人；新文学；心理学；启蒙

文学革命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形成的重要节点。在文学革命中，不仅朱希祖、钱玄同、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傅斯年、罗家伦等作为学生一代的《新潮》同人，都就“文学”的定义、性质作出了深入探讨。从“文学”概念的确立到探讨文学革命如何重建文学以及整个知识的秩序，继而确立新文学的启蒙伦理，《新潮》同人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以来自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等知识资源重建“文学”在现代知识分科中的位置，明晰“感情”之于“文学”的核心地位，正是学生一代的《新潮》区别于师长的显著特征。对《新潮》同人“文学”界说背后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心理学知识资源进行“相对化作业”^[1]，即通过剖解《新潮》同人附着在“文学”之上的知识构造，不仅能复原文学革命中“文学”这一概念的复杂面向，更能看到其对新文学启蒙伦理的深入推进。

一 文学革命的路径分歧与思想的凸显

文学革命在历史叙述中往往被固化为一场整齐划一的文学革新运动。事实上，即使革新派内部也存在路径分歧。胡适和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路径就有不同的规划。有研究者指出，在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之前，胡适对白话的态度已由个人情感的喜好和启蒙工作的便利提升为理论的自觉主张，“将文学革命理解为语言工具的革命”^[2]。与胡适不同，从《新青年》通信栏中陈独秀对胡适“文章八事”的回应可以看出，“与胡适倾心于文学工具的变革相比，陈独秀此刻更希望着眼于与形式相连的思想层面的改变”^[3]。在《新青年》同人里，钱玄同也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学之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4]，认为“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5]。随着“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渐盛大”，



“思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周作人就指出：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会阻碍文学的发达，但“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则没有用处，“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6]。周作人的意见颇能代表当时新文化阵营里相当一部分同道的意见，傅斯年就专门引用这些文字，表示自己“很受点感动，觉得他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7]。其实，从最初界定“文学”开始，傅斯年就强调“文学”的思想。

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的“读者论坛”发表《文学革新申义》。由于大量阅读过严复、蒋维乔、席勒等人的逻辑学著作，并选修过由章士钊开设的论理学课程，傅斯年以其熟悉的逻辑学方法——“属加种差定义”法^[8]来界定“文学”这一概念：

今试作文学之界说曰：“文学者，群类精神上之出产品，而表以文字者也。”此界说中有“群类精神”上之出产品之总（Genus），与“表以文字”之差（Difference）。历以论理形式，尚无舛谬。文学之内情本为精神上之出产品，其寄托之外形本为文字。故就质料言之，此界说亦能成立。^[9]

傅斯年在定义中将文学视为社会精神的文字化表达，这是一种非常广义的文学概念。在晚清以来的学人里，章太炎植根于“文字性”的“文学”定义也不可谓不广泛^[10]。但与章太炎不同的是，傅斯年这一泛化的定义将“文学”和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种”并列并归入“群类精神”这个“属”，继而得以从更宏观的视角处理文学革新的历史与时势。根据逻辑学的规则，属种关系是一种真包含关系，作为下位概念的“文学”“社会”等必然体现出与作为上位概念的“群类精神”相同的性质。因而，既然“变迁”是其它下位概念的属性，那么它必然也是文学的属性。再者，“精神生活本有创造之力”，“文学”作为“精神生活”下的子类，自然也有“创造之力”，应该“辉光日新”^[11]。

傅斯年在论证文学革新的“历史”与“时势”时，其实提出了一套评价“文学”之优劣的标准，这种标准与“古典主义”针锋相对，显然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曾指出

古典文学铺张堆砌而失抒情写实^[12]。傅斯年则从三个角度直言“古典主义”的弊病：“意指为古典所限，而莫能尽情；文词为古典所蔽，而莫由得真；发展性灵之力为记忆古典所夺，而莫能尽性，文以足言之用，全失其效，且反为言害矣。”^[13]从这段话反向推论，则傅斯年心目中理想“文学”的标准应为：“尽情”“得真”和“尽性”。也正是基于这一标准，他又延续师长的路径继续批判桐城派和选学派，并将新文学的标准明确为：“篇篇有明确之思想，句句有明确之义蕴，字字有明确之概念。”^[14]由此，在“表以文字”之外，傅斯年又为“文学”提出了“尽情”“得真”和“尽性”三种区别于“群类精神之出产品”的“种差”特质。

在傅斯年的界定中，“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子类，具有精神创造力，其作用在于“宣达心意”^[15]。不过，“心意”要发挥“创造之力”，还有赖其它知识资源——尤其是哲学的支撑。1918年10月，傅斯年致信蔡元培讨论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时，就提出取资哲学、补文学思想之浅陋的想法：他认为中国文学“缺普及之性”而“高典幽艰”，因无科学家而致文士“以玄语盖其浅陋”，而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为材料”，“于各种问题恒求解决”，因而自然可以弥补中国文学的“浅陋”^[16]。在其著名的《戏剧改良各面观》一文中，傅斯年更是倡议：“在文学的技术而外，有个哲学的见解，来做头脑。”^[17]

傅斯年把哲学作为文学的“头脑”，基于对各部门学科性质的体认及其内部秩序的思考，采取的其实是一种知识分科的视野。知识分科得益于晚清以来学制变革的制度性保障，京师大学堂章程早已推动“文学”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只不过其内涵指向的还是传统的“词章之学”^[18]。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等《新潮》同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老师朱希祖论说“文学”，也同样基于现代知识分科的视野。朱希祖从批驳其师章太炎以一切学术为文的观点入手，强调文学与哲学、宗教、法律等的区别。他不仅强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还指出文学“必有种种极深之科学哲学以为基础”。按照朱希祖绘制的图表，所谓科学哲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十多种来自西方的分科知识。由此



可见，朱希祖论述的“文学”所凭藉的知识资源极为广泛，文学的要义之一在于不以特别知识而以普通知识为标准。这就意味着作为文学基础的科学哲学，指向的其实是一种类似常识储备的学养。至于傅斯年强调的作为“文学”之“头脑”的哲学，朱希祖也有论及，不过他是将其作为“美妙之精神”加以论述的。朱希祖认为“精神愈美妙，感动之力愈强大”，“感动之力”就是评判“文学良否之标准”^[19]。虽然同样从知识分科的视野探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但对傅斯年来说，哲学并非文学写作的储备，它与思想启蒙关联，不仅是纠正中国文学之“浅陋”的必备知识资源，而且是与人生的感悟直接相关、用以指导人生的基本准则。

以哲学为“文学”之“头脑”的主张不是傅斯年个人的观点，而是《新潮》同人的共识。与傅斯年一样，罗家伦也把“文学界说”作为文学革命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罗家伦采取先破后立的思路，首先抓住阮元因主张骈文，故而只以用韵者为文的核心要点，认为他“从根本上把文学的定义下得极窒”；其次再围绕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提出的“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观点展开批评。罗家伦认为章太炎把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都当作“文学”，违背逻辑、拘于故训，混淆了文字和文学，并指出文字仅是传达意思的器具，文字就是辞，不必像小学家一样咬文嚼字^[20]。虽然对章太炎的理解与阐释还不够深入，但罗家伦已从根本上否定其“文字性”的思路，对其背后的小学传统不屑一顾，这实际上是对传统学术范式的否定。

相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定义，罗家伦对西方的“文学”定义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他先是列举了西方的15种文学定义，然后参考各家意见，按顺序列出“文学”所必备的八种要素：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同批评；最好的思想；想像；感情；体裁；艺术；普遍；永久。最后，他归纳这些要素，将“文学”定义为：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写下来的，有想像，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21]

从罗家伦的这一定义看，其“文学”概念虽

兼及“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但二者的地位不尽相称。在罗家伦的定义中，“文学”写作的对象是“人生”，“没有人生就没有文学”。“人生”本就是《新潮》的关键词之一，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22]一文以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为其人生观方案的重要理论资源，因应青年的人生难题，曾引发广大青年的强烈共鸣。罗家伦强调“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背后，未尝没有这种哲学的考量。在《新潮》同人的视域里，所谓“最好的思想”就包括其在人生观讨论中凭借的以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至于“想像”“感情”“体裁”等要素，则被罗家伦排在了“人生”与“最好的思想”后面。从“宣达心意”到以“哲学”为“文学”的“头脑”，可以看到一条“思想”逐渐凸显的文学革命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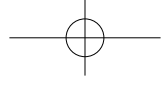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二 心理学知识资源与“感情”的发现

《新潮》同人把思想作为文学的核心要质，事实上包含着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摒弃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革命路径，转向直指“人心”的文化革命的基本共识^[23]。对此，罗家伦曾有精辟的总结：

以政治的势力改革政治是没有用的，必须从改革社会着手；改革社会必须从改革思想着手；但是改革思想，必须有表现正确思想的工具。况且我们现在觉悟到人生的价值了，尤不能不有一种表现“人生正确思想的工具”。所以我们大致都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24]

由此可见，作为新文化运动高潮的文学革命汇集了新文化同人改革社会的强烈诉求。在《新潮》同人的视野里，“文学”并非单纯指向个人情操和审美趣味的“纯文学”，而直指社会改造；所谓“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已然为新文学“为人生”的诉求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以文学为改革社会工具的启蒙机制中，思想占据了关键的位置。文学是表现思想的工具，承载正确思想的新文学，是祛除国人荒谬思想的解毒剂，这就是文学革命中思想凸显背后所隐含的启蒙伦理。

然而，新文化同道把文学当作承载新思想之工



具的启蒙伦理背后，却难免覆蹈其激烈批判过的传统的“文以载道”之逻辑。一方面，无论是胡适提倡的“言之有物”，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还是罗家伦批判华夷时代的闭关文学，都把矛头对准以儒学为核心的“文以载道”之“道”。《新潮》同人把来自西方的哲学思想作为“文学”的“头脑”，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对“文以载道”之“道”的反叛和超越。但另一方面，凸显思想的文学革命路径却未能超脱“文以载道”的“话语逻辑”——“‘文’与‘道’虽分别被赋予了新内涵，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共生依存关系”^[25]。从根本上看，无论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还是新文学家一再强调的把新文学作为承载思想的工具，其核心都是文学工具论，文学与思想仍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

基于此，傅斯年反思道：“把白话文学分做内外两面，也是不通的办法”，他指出真白话文学必须包含三种质素：“第一，用白话作材料；第二，有精工的技巧；第三，有公正的主义；三者缺一不可。”在傅斯年的视野中，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是“材料和主义不能相离，去创造内外相称，灵魂和体壳一贯的真白话文学！”^[26]傅斯年并非质疑新文化同道的文学革命路径，事实上，他对文学革命的理解也是从形式与内容/思想出发的，其基本判断也是文学改革应该把重点从形式转移到思想上。傅斯年把语言形式的变革称为白话文学的“介壳”，即把“口里的话写在纸上”。按照他的判断，白话顺应自然之势，前途很宽；反之，与介壳相对的白话文学的“内心”——“人生的深切而又著名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则“前途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国人数千年来对人生没有透彻的见解；从现实来看，极少有人觉悟，“开辟人荒”难于上青天。正是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傅斯年把文学革命的路径明确标示为“从白话文学的介壳跳到白话文学的内心”^[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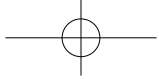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然而，傅斯年所谓的文学的“内心”虽指向“辟人荒”的思想启蒙实践，但他对“思想”的意涵却有着更深的考量。傅斯年指出：“思想原有广、狭两层意思，狭意的就是心理学上所谓‘思想’，广意的就是心理的总称。”^[28]那么，傅斯年此处所谓的狭义的心理学的“思想”到底指向什

么呢？傅斯年本人并没有展开说明，不过在前一期的《新潮》杂志上，汪敬熙却写了一篇颇具分量的文章——《什么是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专门解释了这一问题。他依据自己所信服的华生等行行为派心理学的知识，指出“思想就是在一个困难情形之下，自然引起的心内的动作，利用已往的经验求渡过现在的困难的方法”^[29]。汪敬熙又根据杜威的 *How We Think* 一书对思想历程的划分，把思想的过程分为目的、对于当时情形的解释、问题的解决、信心四个步骤^[30]。从汪敬熙的分析来看，其所谓的思想即心理学上的思惟（thinking），它更倾向理性的认知过程^[31]。傅斯年此处所谓的心理学上狭义的“思想”，指的正是理性的认知过程。因此，他才会针对“思想”，提出“感情”这一概念：

思想一种心理作用，发达最后，因而力量比较的薄弱。必有别种动机，然后有思想；而思想所得，又多不能见诸行事。思想固然有一部分创造的力量，然而不如感情更有创造的力量；感情主宰思想，感情决定行事，感情造成意志。感情是动力，因而影响一切的效果很大：——这是思想所不及的。^[32]

那么，傅斯年这段文字中的“感情”又指向什么呢？假如我们结合傅斯年1919年前后对心理学知识资源的汲取来看，其对“感情”的理解将得到清晰的呈现。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依然延续晚清的传统，把心理学附设在哲学门下^[33]。1914年，新任北大校长胡仁源聘请曾经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影响的陈大齐任教。陈大齐就职后，把现代的心理学的知识系统带入北京大学。据《1917年北京大学哲学门一年级课表》^[34]，陈大齐在哲学门讲授“心理学”和“哲学概论”两门课程。而《新潮》同人中的不少成员均为哲学门的学生，再加上北京大学当时开放的学习风气，陈大齐心理学课堂上的学生中，《新潮》同人占了相当的比例。陈大齐的心理学课堂讲稿后来结集为《心理学大纲》出版，这是北京大学丛书的重要书目之一，《新潮》杂志亦以广告和书报介绍的形式多次予以推荐^[35]。在这本被《新潮》同人重点推荐过的著作中，陈大齐就曾专门列出单章论析过“感情”这



个概念。他认为“感情”(feeling)为“精神作用之第二种原素”，“外物刺戟有机体”而产生的形式即为感情的性质，由外物的刺激所生的“快乐”与“不快乐”，“亢奋”与“沉抑”等诸种形式，均会使有机体产生相应的行动^[36]。傅斯年指出“感情”具有主宰思想、决定行事、造成意志的创造性力量，从某种程度上看，与陈大齐指出的“感情”经由刺激使有机体产生行动的看法具有共通性，他对“感情”的认识不排除陈大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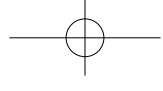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不过，傅斯年对“感情”的认识更来自其对西方心理学知识资源的直接汲取。1919年前后，在同人规划的新潮丛书中，傅斯年曾撰写《心理分析导引》^[37]一书，该书目前存稿五章。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傅斯年以弗洛伊德的《原梦》《心理分析入门演说集》等著作为主要参考书目，并参考达尔文、黑克尔(Haeckel，即海克尔)等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理论，集中阐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思想。傅斯年先为读者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学术史背景，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对过往哲学史和心理学史上‘人为理性的动物’的彻底解构。他借用达尔文所证明的‘一切生物俱是同源’，‘人兽之间，在心理上和在身体上相等，是没有不可越的界限的’这些进化论的观点指出，‘人为理性的动物’这句话从科学知识来看‘不合事实’，乃是‘人类自大的话’；而所谓‘理性’，不过是‘哲学家’发明出来制造人与动物之区别的概念罢了^[38]。傅斯年此处所谓的‘哲学’，特指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家依赖纯粹的思想推衍，与《新潮》同人倾心的以‘经验’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大相径庭。

正是基于对“理性”的批判，傅斯年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愿欲”(即“欲望”)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动力：“人的行为的单位，或说原素，是‘愿欲’，而以感情领导着运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并不由理性。”^[39]把傅斯年此处对人类行为原动力的解释与他对感情与思想之关系的阐述放在一起对比，其对思想、感情的认识便彻底浮出水面。傅斯年所谓的“思想”，其内核便是理性；所谓“感情”则是一个与理性相对的概念，它的核心是欲望。傅斯年所谓的感情的创造力——

“感情主宰思想，感情决定行事，感情造成意志。感情是动力，因而影响一切的效果很大”，其知识来源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正是基于感情比思想更有创造力，感情才是人类行为之动力的认知，傅斯年对文学革命中的思想启蒙路径作了深入推进。傅斯年提出，“单说思想革命，似乎不如说心理改换包括些，因为思想之外，还有感情，思想的革命之外，还有感情的发展。”^[40]这也就意味着，与新文化同道把“思想”作为新文学之内核的文学观不同，在傅斯年这里，新文学的内核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感情”。

那么，傅斯年与理性相对的“感情”概念，其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这同样要追溯到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中的“感情”这一核心概念。感情/情感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对应的英文单词是 affect。“它包含所有的情感状态，无论是痛苦的或愉悦的，模糊的或清楚的，无论其表现方式是大量的卸载或寻常的情绪。依据弗洛伊德，所有的欲力都表现在情感及表象这两个层面上。而情感是欲力能量及其增减变化之质的表现。”^[41]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傅斯年为何指出人类行为的原素——欲望由感情领导着运行。

不过，傅斯年对“感情”的理解仍不乏个人化的因素。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里，情感与歇斯底里症的治疗紧密相关，他曾指出歇斯底里的产生是由于情感滞塞。同时，弗洛伊德还认为“只有当对记忆的唤回能够使原本连结在此记忆上的情感复活时，回忆才会产生治疗效果”^[42]。研究者指出，作为一名医生，弗洛伊德在治疗癔症病人上采用的是完全不同于一般医学从业者的手段——“他从生物性的解释转向了叙事性的解释，从患病的身体转向了患病的记忆”，“从生理学模型转向了心理学模型”^[43]。而傅斯年尽管在《心理分析导引》的第2—5章全面论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并对其心理学说的核心概念与范畴作了不乏真知灼见的概述，但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解却是完全从生物科学出发的。首先，傅斯年从达尔文“一切生物俱是同源”的进化论学说，以及黑克尔的“覆袭律”(Law of Recapitulation)为切入点，进而定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学术地位。傅斯年指出，所



谓“覆袭”，是指生物机体的发育历程是“抄他的祖先由原生物到他的本族数千万年所经过的历史”，机体上的覆袭由进化论者和发生学家确立，心理上的覆袭与之平行，“是人的种族心理进化的一个缩短了覆袭——乃是伏氏心理学之功绩”。傅斯年认为进化论应包括生物的进化论与心理的进化论，即所谓“双扇进化论”，而到了弗洛伊德，才大致完成“心理进化论”。正是通过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纳入进化论的科学谱系，傅斯年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心理等于人的机体，一般的复杂，一般的自动变来，一般的受进化论一切原则的支配。果真彻底的把心理学当做生物科学，后来可以‘见怪不怪了’。”^[44]

事实上，弗洛伊德早期确实受到其生理学老师恩斯特·布吕克的影响，也是机械论者——相信心理疾病皆有生理原因，同时，他确实也在早期受到海克尔“生物发生律”的影响^[45]。但弗洛伊德“很快便开始相信心理学在精神生活中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一种脱离了严格生物学原因的角色”^[46]。特别是当弗洛伊德写成傅斯年主要借鉴的著作《原梦》时，其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已基本成型，所谓“生物科学”的理论背景，在其理论体系中已基本淡化。

由于傅斯年完全从生物科学的角度来接受、理解弗洛伊德，他受其影响提出的“感情”这一概念，也带着生物科学的影子。因此，傅斯年才会指出，要进行思想革命，“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说晓喻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感动力”^[47]。也就是说，“言说晓喻”式的思想启蒙并不能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只有理解是枉然的，还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直击人的本能；而作为“文学”之特质的“感情”，就是一个与人的生理本能直接相关，能够刺激人产生行动的概念。

三 文学启蒙伦理的心理学置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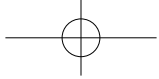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由于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观点，再加上傅斯年个人化的发挥，基于人的本能的“感情”

及其“刺激作用”在他这里就显得比“发达最后”的“思想”更有力量。“感情”于是在傅斯年这里成为文学的核心要质。其实，早在《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中，傅斯年就把传统的“性情”“性灵”等概念作为评价古代文学的标准。后来罗家伦依据西方的文学定义，又进一步把感情、想象等作为文学的重要因素。但“感情”何以作为“文学”的核心，却悬而未决，直到傅斯年经由心理学知识资源，指出“感情”相较于思想的重要作用之后，学生一代的以“感情”为基点的新文学启蒙伦理才彻底浮出水面：

现在希望一种有价值的新文学发生，自必发挥我们大家的人的感情，受一件不良社会的刺激，便把这刺激保持住，来扩大起来，研究起来，表现出来，解决了来，——于是乎有正义的文学。^[48]

在傅斯年看来，中国缺乏伟大文章的原因正在于中国人“感情薄弱”。因此他指出：“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缺乏人的思想，不如说他缺乏‘人’的感情；我们与其说俄国近代文学中富有‘人’的思想，不如说他富有‘人’的感情。思想尽管高明，文章尽管卑劣；一旦有深沉挚爱的感情发动，自然如圣灵启示一般，欲罢不能。”^[49]这种“圣灵启示”般的“刺激”作用，傅斯年认为“动人心速，入人心深，住人心久；一经被他感化了，登时现于行事”^[50]。在这样的逻辑中，新文学的启蒙伦理便由文字形式的变革、思想层面的变革深入到心理的变革上，其深层逻辑就变成“感情”-“刺激”-“行动”的心理学原理。由此，新文学的启蒙动力被导向更加深层的生理本能层面，作为启蒙的“文学”因而更具有肉身性与可行性，不再是空泛的口号与无聊的说教。

事实上，作为近现代开文学启蒙之先河的梁启超，也曾经论证过小说“浸”“熏”“刺”“提”的功能。在“刺”这一功能中，我们甚至能明显看到傅斯年与梁启超的精神联系。梁启超言：“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51]梁启超对小说功能的这一论证，有研究者认为已触及人的知觉和感情，是为了说明小说可以让人机械、迟钝的知觉和感情保持敏锐的状态^[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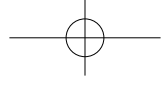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换言之，其实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机制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人的心理机能。不过，傅斯年虽然和梁启超一样都涉及感情/刺激的心理启蒙机制，但傅斯年是把“感情”作为文学的核心素质，强调“内外相称”，要创造“肉体 and 灵魂一贯的真白话文学”；而梁启超强调小说（文学）的感染力，只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彻底的功利主义宰治了文学，其功利的文学观与新文化派所批判的“文以载道”正是同一逻辑。更何况，对于“道”的内容，傅斯年及其代表的新文化派与梁启超有根本的区别，梁启超在政治/思想/文学上的“调和”倾向正是新文化派指摘其文学实践的根本原因。

而在文学革命中，胡适也曾用“情感”和“思想”作为“言之有物”的内容，以此来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不过，此时倾心于形式变革的胡适，并未对“情感”与“思想”展开深入探讨。他对“情感”的阐释，来自《诗序》的“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至于“思想”，也是笼统地以“见地、时力、理想”概括之^[53]。而且胡适所谓的囊括“物”的两个面向——“情感”与“思想”是平行的关系，与师长相比，傅斯年却把“感情”置于思想之前，只有触及本能的感情刺激，才能促进思想的转变。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新潮》同人语境中的“感情”与晚清以来的师长所论述的“感情”/“情感”，凭借的是不同的知识资源。研究者曾指出，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的发端可追溯至晚明，其时的“主情反理”倾向即带有启蒙的意向，而戴震的“情感哲学”则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提供了“探求人性解放的思想资源”^[54]。如果说自晚清以来的师长更偏向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寻找“情”的脉络，那么《新潮》的学生们则倾向把“感情”的基础溯源至西方的心理学知识资源，而且支撑《新潮》同人吸收心理学知识资源的根本逻辑，乃是“科学的主义”。

前文已经论及傅斯年从生物科学的角度来吸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其论述的“感情”基于人的生理本能，故而傅斯年认为其更根本、更有创造力，并且能够刺激人的行动。而与专注弗洛伊德心理学译介的傅斯年相比，汪敬熙、朱自清、杨振声等倾心于行为派心理学的《新潮》同人，更重

视“科学主义”的脉络。朱自清曾在《新潮》上刊载译自麦独孤的《心理学》一书的《心理学的范围》一文。文章开篇就用着重号标出“心理学是积极的行为科学”这一观点，且朱自清指出“行为”这一概念不含玄想的推论或假定的方法，是“从公认的事实出发，不含理论的偏见”^[55]。与朱自清相比，汪敬熙在就读本科期间就表现出对心理学的强烈兴趣。在《新潮》上，他追踪西方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动向，先是介绍了《不列颠心理学杂志》上刊载的最新会议论文，继而又在赴美留学期间撰文介绍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从汪敬熙的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最赞成的是麦尔士（Myers）、华腊士（Graham）和墨独孤（William McDougall）的观点^[56]。汪敬熙并没有在文章中解释自己为何更赞同上述三位心理学家的观点，不过他在《心理学最近的趋势》一文中，通过归纳西方自翁德（即冯特）以来的心理学史，认为心理学最近的趋势是：研究对象上，怀疑研究意识的不当，以行为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不再重视内省法，注重本能情绪及习惯之研究，倾向实用之趋势日益明显，打破翁德、铁钦纳、司道体等专恃分析的构造派的心理学，趋向行动主义的心理学^[57]。

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与科学的区别，《新潮》同人中的杨振声倒是有清晰的认识。1922年，在美国留学的杨振声为《新潮》杂志撰文介绍西方最新的心理学著作——谭嗣锐的《新心理学》（A. G. Stanley. *The New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Life*）。该书是谭嗣锐（现一般译作：斯坦利）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概括，为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8]。从杨振声的介绍可以看出，他最看重的是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无意识”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冯特以来的心理学者以官感、印影、简单的情感为构成心理现象的原质，其研究方法专限于内省法，这与源于玄学的、注重内省、偏于主观描写的传统心理学并不能有效区别开来。不过，杨振声同时也指出斯坦利这本著作的不足，他认为这本书有勉强比附之处，“心力（Psychic energy）等说，自安于逻辑的假定，不能溯源于生理及神经系统，以求客观的真实。总之全书多偏于理论，颇乏生理与实验的根据”^[59]。这实际上是通



过批评谭嗣锐的著作，间接批评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非科学性。因此，杨振声虽然间接批评了弗洛伊德，但与傅斯年的误读其实是同一逻辑，二者都把“科学”作为评价心理学的重要标准。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之一，“科学的主义”则是《新潮》创刊之初就由同人定下的宗旨^[60]。这一宗旨不仅是《新潮》同人译介心理学知识资源的准则，更经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创造性转化，贯彻到文学革命中。由是，在《新潮》同人这里，与理性相对、作为文学之特质的“感情”，其深层的基础依然是可供实验研究的生理本能，文学因此与科学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新文学的启蒙机制于是有了“科学”的基础。

傅斯年引入达尔文、海克尔等人的生物学说来阐释弗洛伊德，从而使弗洛伊德的学说带上了浓厚的科学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海克尔一元论的种族发生学也曾是鲁迅理解人类生物特性的重要知识资源。1907年，鲁迅写作《人间之历史》，发表于《河南》杂志，后收入杂文集《坟》时改为《人之历史》。鲁迅在文中高度赞扬海克尔的学说，称其“种族发生学”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61]。不过，近来研究者指出，鲁迅的立场其实与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存在诸多矛盾，最明显的是鲁迅对科学有所反思，认为自然科学应当有所边界，鲁迅看中的不是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而是理性宗教^[62]。与鲁迅“拿来主义”的态度相比，《新潮》同人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显然更为偏激。相应地，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的“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文学”之“撷人心”的作用相比，《新潮》同人所突出的基于文学的“感情”的启蒙机制，难免陷入“唯科学主义”的泥淖。

但无论如何，《新潮》同人引入心理学知识资源推进新文学的启蒙伦理，仍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通过《新潮》同人心理学知识资源的引入，新文学的启蒙伦理才变为直接与行动相关的基于“本能”的“刺激”；作为新文化运动之高潮的文学革命，才真正具有了把思想革命推向行动的可能。“文学”也不再是一个观念性的“群类精神之出产品”，而是一个具有创造力、行动性的即物性概念，一个把思想革命推向高潮与实践的能动的

精神产品。而在现代文学史的系谱中，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钱锺书等同样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63]相比，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潮》同人虽未产出文学的硕果，但其对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足以在文学和思想的领域独树一帜。

[1] 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第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2] 朱晓江：《语言与思想：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受抑及转向——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为参照》，《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

[3] 宋声泉：《民初作为方法：文学革命新论》，第15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4期，1917年6月。

[5]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1期，1917年3月。

[6] 周作人：《思想革命》，《每周评论》1919年3月2日。

[7][26][27][28][32][40][47][48][49][50]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

[8] “属加种差定义法”也是当时国内学术界被引介最多的逻辑学定义法，如蒋维乔的《论理学讲义》在“定义”部分涉及的主要就是该方法，参蒋维乔《论理学讲义》，第31—32页，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该书初版于1912年。

[9][11][13][14][15] 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年1月15日。

[10] 章太炎曾在《文学总略》中将“文学”定义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又言：“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故谓之文。”参章太炎《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疏证，第247、262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2]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

[16] 傅斯年：《傅君斯年致校长函 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8日。

[17]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

[18] “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制度性支持，参陈国球《文



从思想革命到心理改换

- 学如何成为知识? : 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第 36—76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 [19] 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19 年 1 月。
- [20][21] 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2 月。
- [22]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第 1 卷第 1 期,1919 年 1 月。
- [23] 参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
- [24] 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第 2 卷第 5 期,1920 年 9 月。
- [25] 王本朝:《“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文学评论》2010 年第 1 期。
- [29] 汪敬熙:《什么是思想?》,《新潮》第 1 卷第 4 期,1919 年 4 月。
- [30] 汪敬熙在这段文字的注释中说明了其划分的来源是杜威的 *How We Think* 一书。
- [31] 根据《剑桥心理学辞典》的解释,thinking 包括三层含义:1) 意识流和它的所有内容,包括沉默之声、情绪、意象以及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感知。2) 为行为和所有经验现象奠基的过程。3) 心灵的任何产物,如判断、态度、知识、意见和信仰。参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David Matsumoto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9, p. 543。
- [33]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第 72—7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34] 《〈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制定》,参《北京大学日刊》1917 年 11 月 29 日。
- [35] 在《新潮》第 2 卷第 1、2、3 期的广告栏和第 1、2 期的书报介绍栏,同人都曾重点推荐过这本著作。
- [36]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第 68—79 页,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
- [37] 该书残稿收录于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 315—344 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据毛子水附识,傅斯年的《心理分析导引》是其 1919、1920 年间为《新潮丛书》所写的未完稿,当时并未出版,参《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 344 页。
- [38][39][44] 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第 315—322、318、324 页,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41][42] 尚·拉普朗虚、尚·柏腾·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辞汇》,沈志中、王文基译,第 12、12 页,行人出版社 2000 年版。
- [43][46] 帕梅拉·瑟齐韦尔:《导读弗洛伊德》,李新雨译,第 23、9 页,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 [45] 托马斯·哈代·黎黑:《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流派》(第 6 版),蒋柯等译,第 230—23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 [5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选自《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十》,第 7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52] 李振声:《重塑文学精神之源: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晚清思想学术因素》,第 12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 [53]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 年第 5 卷第 2 期,1917 年 1 月。
- [54] 张光芒:《启蒙论》,第 8 页,三联书店 2002 年。
- [55] 朱自清:《心理学的范围》,《新潮》第 2 卷第 3 期,1920 年 2 月。
- [56] 汪敬熙:《本能与无意识》,《新潮》第 2 卷第 4 期,1920 年 5 月。
- [57] 汪敬熙:《心理学最近的趋势》,《新潮》第 2 卷第 5 期,1920 年 9 月。
- [58] 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龚卓军等译,刘森尧校订,第 509 页,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 [59] 杨振声:《谭嗣锐的〈新心理学〉》,《新潮》第 3 卷第 2 期,1922 年 3 月。
- [60]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 2 卷第 1 期,1919 年 10 月。
- [61] 鲁迅:《人之历史》,收《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62] 孙尧天:《跨文化语境中的〈人之历史〉——重审早期鲁迅与海克尔、泡尔生的思想联系》,《东岳论丛》2020 年第 1 期。
- [63] 弗洛伊德与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系统梳理,参王宁《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4 期。
-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责任编辑:何吉贤